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走向展望

2021 年 5 月 7 日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不仅关乎双方利益，也关乎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今年年初，拜登政府上台，这是否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次调整的机会？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相比，对华政策会有哪些异同？拜登是否会延续特朗普对华政策？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邀请到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围绕“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走向展望”做主旨报告。

王勇教授指出，当前中美关系非常复杂，两国已经形成了全球性的竞争关系。因此如果要从纷繁复杂的现状中找出相对客观的看法，需要将中美关系放在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下。此外，在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战略竞争格局形成加快。拜登政府上台 100 多天以来，学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评估，但分歧较大。主要的问题集中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与特朗普的政策是否存在区别？如果有是怎样的区别？拜登给中国带来的威胁是否会高于特朗普？此外，针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这一问题，王勇教授认为，应当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趋势上予以对待。

• 疫情、全球化与中美关系：分析框架

疫情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和全球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暴露出美国在过去很难看到的制度性和结

构性问题。总体看，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各国在此过程中都有所获益，但在利益分配方面，经济全球化仍存在很大问题。虽然它推动了全球供应链的形成，但全球供应链却存在着高端、中端、低端之分。美国发动和领导了经济全球化，而中国则是积极参与全球化，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做起，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攀升。中美双方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由于两国的发展阶段、国家体制的不同，在经济全球化分工链条中地位不一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同时，经济全球化使中美关系出现了两个始料未及的结果。第一，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设想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时，更多的认为中国将长期处在全球供应链的低端，最多到中端水平。但是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却展示出了中国在新经济中的实力。中国的崛起来自正确的战略选择（开放与市场经济），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机遇，同时打破了全球供应链上下游关系，这也导致西方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美国西方“吃亏论”。第二，意识形态的挑战。经济上的成果恰恰反映了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展示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在疫情时期更加彰显中国体制的优势。这在美国和西方看来，是对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挑战。过去他们设想中国可能会发生和平演变，最后政治体制发生变化，但这一幻想被中国一次次打破，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

现在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认识到这两个巨大的变化，由此带动中美关系和中西方关系的变化，这也使得中美关系未来处理起来将会非常困难，特别是在价值观、

意识形态方面。

美国国内分裂十分严重，红和蓝的分裂也反映出美国沿海地区和内陆的分裂，反映出美国阶层的分裂，即上层精英和中下层民众之间的差异。美国 10%的人口掌握了 70%以上的财富，前 50 位最富有的人掌握了 50%以上的财富，且这个比例在疫情中更加恶化。在过去 30 年中，美国底层 50%的家庭净资产不升反降。在过去 40 年中，美国的工资水平没有变化。美国相对衰落的内外动因包括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国际实力下降；政治社会全面分裂；种族关系紧张；枪支暴力等。美国国内危机会蔓延至美国的对外政策，而美国的应对却是转嫁危机、转移国内民众视线，手段包括超发货币、经济救助计划等。利用“中国竞争”团结国内民众、抑制中国崛起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目标，同时利用反亚裔仇恨转移美国国内种族关系紧张。

• 特朗普对华政策结果：中美关系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战略竞争格局加快形成

中美关系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从以合作为主变成以冲突、竞争甚至战略竞争为主。特朗普上台之前，中美关系较好，在气候变化等多个问题上开展密切合作。但在奥巴马执政后期，已经可以看到美国国内对于民主党对华政策的不满，对中美关系的不满。美国民粹主义势力已经从下层慢慢往上波及。特朗普时期，四个对话机制中断，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经贸关系成为冲突竞争的新战场，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具威胁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竞争全面展开，关系逐渐滑向新冷战。其中，除国家战略竞争、大国竞争外，在 2020 年疫情期间，

中美关系表现出的新冷战特点越来越明显：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治理模式竞争均有所加剧。在 2008 年之前，美国学界的一些专家认为，经济全球化下出现了“中美国”现象，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在这种关系中，美国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但总体来说，这种关系对美国是有利的，美国愿意维持这种关系，并且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关系是可持续的。但在特朗普时期，这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美中全面脱钩被列入其政策议程。

围绕对华政策，美国对华三派合流，涉华公共舆论急剧恶化。自 1979 年中美建交以来，这种局面从未出现过，但在过去四年中，情况发生改变。其一，贸易鹰派方面：中美贸易关系中，美国是吃亏的一方。美国工商界认为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封闭。美国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市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主张要采取强硬措施打开中国市场。其二，安全鹰派方面：出于极端的意识形态的考量，将中国视为美国霸权的最大挑战者，主张对中国采取措施。这些人往往来自美国安全情报部门，以及国内保守势力，也包括军工复合体势力。其三，人权鹰派方面：以民主党为主，在抗疫、监控、新疆等问题上发难，认为要对中国采取强烈的措施。同时在对华问题上出现“新麦卡锡主义”，温和精英慎言、禁言，全球化精英的声音受到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势力的压制。

疫情加剧中美竞争，“新冷战”危险增强。首先，当疫情在中国大规模爆发时，保守派喉舌《华尔街日报》发表了标题为“中国是东亚真正的病夫”的评论。特朗普政府开始

策划利用疫情，认为这是制造业回流、重振美国制造业最好的机会。但之后情况出现反转，中美应对疫情的方式、效果差别突出。新冠疫情加剧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竞争，所以中国的抗疫援助、国际合作被“政治化”、“妖魔化”。为掩盖疫情处置失当，美国大力宣扬“中国病毒论”“实验室泄露论”“中国人造病毒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中共世界威胁论”等论调。

因此，中美想要合作抗疫，即使在拜登上台之后，也很难展开，因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鹰派更是试图发动新冷战，推动中美全面脱钩。舆论战方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发布指令，要对中国进行舆论战，利用疫情煽动对华仇恨，转移国内视线。意识形态方面，美国试图建立一个遏制中国的统一战线。在国际领域，美国力图将中国新增的影响力推回，其强硬派制造对华舆论的“白色恐怖”。其中，“五眼联盟”是响应美国新冷战政策的主要力量。通过抹黑中国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逼迫从欧洲到亚太的其他国家“站队”。与此同时，美国还利用在不同领域的结构性权力，试图将中国排除出包括货币、互联网在内的现有全球体制。

• 拜登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走向

拜登对华政策将面临国内外双重因素影响。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中下层的情绪被释放，给之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带来了强大制约。第一，美国分裂加剧，未来将受到没有特朗普在位的“特朗普主义”及其支持者的压力。他们在美国的舆论及中下层当中占据了很大的势力。第二，两党竞争事

关未来权力地位，党派斗争将更加激烈。在美国国会中，尽管民主党在上次选举后占据领先的地位，但优势非常脆弱，而在参议院，两党议席相差不大。因此，未来如果对某个决策出现分歧，都需要担任参议长的哈里斯副总统的投票来改变相对平衡。因此，拜登政府在这种政治结构下，必然会非常小心地处理对华关系。第三，受新冠疫情冲击，美国国力及“软实力”大为下降。

考虑到美国当前的政治情况，特别是中下层不满情绪高涨，拜登政府提出所谓“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对外政策”理念。今年3月初发布的美国2021年贸易议程报告称，美国的对外经贸政策要为中产阶级、工人阶级服务，旨在巩固并扩大国内政治支持率。考虑到目前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影响，美国重返TPP的可能性很低，而这恰好给中国等相关国家推动地区一体化提供了机会。

拜登对华政策将不同于特朗普，如美中双方能够妥善处理相关问题，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竞合关系”，即竞争将明显大于合作，中美可能会避免“新冷战”。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定位的调整。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定位，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最大的竞争者，但中美之间不是敌对关系。第二，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需要在所有全球性议题和地区问题上维持领导力和影响力，而要做到这点，就需要中国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例如，在安理会议程中，美国的行动要获得安理会的授权，就需要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第三，拜登的选民基础跟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不同。特朗普的选民基础是美国的中下层，可以说是全球化当中的输家。拜登的选

民更多来自全球化的赢家，如华尔街、硅谷的高科技集团，好莱坞的梦工厂等。那么，这些势力对中美关系持怎样的态度呢？他们不满意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希望中国打开大门，望中美之间能够合作。因此在拜登上台前后，美国重要的工商界组织发表了三份重量级报告，分别来自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华南峰会。报告中均称，他们反对中美完全脱钩，要留在中国继续投资，看好中国市场。实际上，2020年美国工商界在中国并没有撤资，而是增加了对中国的投资，明确对拜登政府发出反对脱钩信号。对于这一点，拜登在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慢慢发挥其影响力，但当前受制于国内政治压力，拜登会比较低调。

拜登的对华政策重视同盟外交，在中美阿拉斯加高级别会谈之前美国拉拢盟国，展开系列对话，壮大自己的声势。拜登政府企图延续特朗普政府以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为主要目标的印太战略，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最终建立包围、遏制中国的亚洲版北约计划。

拜登政府还不断打“人权牌”“价值观牌”“国际规则牌”向中国施压，巩固美国的国际地位。此前由英国提议的建立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 D10（即 G7 加上印、韩、澳三国）得到美国支持。今年年底，美英计划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在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

在对华战略和策略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要进行 3C 战略，即所谓的 Compete、Collaborate and Confront（竞争、合作与冲突），认为应当该竞争的要竞争，该合作的要合作。在存在共同利益的地方可以合作，对于所谓的中国不

遵守国际规则的方面，就要对抗。3C 战略是以竞争为主的战略，并不排斥合作。拜登上台后强调对华耐心，不急于对话。因为拜登首先要恢复与盟国的关系，拉帮结伙巩固自己的基础后，才有可能和中国展开对话，即其宣称的以更强的实力地位和中国对话。当前仍处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检讨阶段，对华战略的完整内容尚未出台。并且在很多重要岗位上，实施政策的官员还没有完全到位。因此可以说，目前只有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轮廓，即美国要坚决与中国展开竞争，绝不后退，维持自身在地区事务和全球事务当中的领导地位。

在对华高科技贸易方面，美国有可能推出所谓的“小院高墙”政策，即看管好最关键、最紧要的技术，这实际上是美国要在国家安全和对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在这个方面，美国首先展示出强硬姿态，出台了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科技企业的更多限制措施。在对待 5G 问题上，拜登政府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进一步加码对华为、中兴 5G 设备获得海外零部件的限制，同时扩大对中国其他企业的限制。美国高科技企业反对中美技术“脱钩”，但主张对中国最先进科技加强限制。

地缘政治竞争有可能变得更复杂，周边形势出现新的不确定局面。美国可能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或领海纠纷，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此外，美国会进一步推动落实“印太战略”，重返亚洲。可以预见，未来会出现更多、更复杂的三角关系，最后都涉及到中美两国。

中美可能会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加强合作，同时伴随着竞争。拜登政府将气候变化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

高度，力争在国家政策的所有方面贯彻气候变化的理念。去年中国作出了力争 2030 年排放达峰值、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个目标减排时间是最短的，压力是最大的。美国可能会向中国施压，加快中国减排进程，同时限制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不过，由于金钱援助和新能源技术的原因，美国推动气候变化外交的能力严重下降。另一方面，目前中美在公共卫生议题上尚未看到合作可能，病毒溯源、疫情处理等问题未来仍具有爆炸性。

美国将会推动重组全球供应链，在一定程度上“去中国化”。在特朗普政府后期，蓬佩奥、罗斯、纳瓦罗等人已经在推动所谓的“经济繁荣伙伴倡议”计划，即去中国化，以意识形态划界，组成一个能够保证美国等市场供应的供应链。拜登政府目前在某种程度上也接受了这样一种倡议，并且在继续推动。借“新疆棉花”事件，以人权为由对中国发起政治经济制裁，再以此为借口向那些在中国投资、与中国有经济伙伴关系的西方工商界施加压力，让他们逐步从中国市场退出，停用来自中国的原材料与零部件，最终达到在全球供应链中排除中国的目的。起初美国寄希望于印度取代中国，但因印度疫情大暴发，要取代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地位可能性非常小。但棉花问题也许是美国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开始。

王勇指出，拜登外交团队不同于特朗普团队，需要耐心、智慧地予以应对。拜登外交团队代表美国的建制派，而特朗普是反建制派，很多对外政策没有章法。拜登团队人才济济、运筹能力强，不可小视。此外，拜登团队的政策可预测性要

强于特朗普时期，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面对拜登政府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中国应表明态度：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希望美方能够正确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希望中美能够开展基于规则的公平良性的竞争，不搞零和游戏的竞争。但在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方应画出红线，对破坏行为坚决斗争。在人权意识形态战线，要坚决斗争，揭露美国侵犯人权的黑历史。

• 中美关系的未来：机遇与挑战

王勇认为，美国对华“新冷战”目标受诸多因素制约，难以实现。中美关系不会演变成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

第一，中国与前苏联有诸多不同，使得美国无法实施“冷战”。例如在经济规模和综合经济实力方面，中国远超前苏联。中国和全球经济融合的程度，参与国际机制的程度也远超前苏联。此外，中国的意识形态目标有限。苏联当时是要推动世界革命，到处插手世界事务，而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开展国际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而不是推动中国模式。

第二，美国社会经济体制存在重大缺陷，国内分裂、政治极化加深，美国相对衰落加剧。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美国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种族关系紧张，人口结构改变，强制犯罪严重。美国债务达到历史第二高水准，仅次于二战时的债务峰值。国内经济“寅吃卯粮”问题严重，特朗普减税计划只会加重美国的财政赤字与税务水准。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冲突严重，社会政治分裂，难以达成普遍共识。但也应看到，面对国内分裂，美国精英阶层迫切需要一个“外部敌人”，因此要警惕美国将中国当成转移国内

矛盾的“敌人”。

第三，中国最大的牌是中国市场，要打好这张“王牌”。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特别是中国有 5 亿左右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对经济影响很大，美国企业急需深耕中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会增加在对外关系当中的筹码，而这将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推动力量，新的竞争形势下“以市场换技术”将可能继续得到执行。

第四，中国经济弹性大，独立性强，政治体制优势明显。这种优势有助于将“危机”化为推动发展的“机遇”，有助于中国在激烈竞争中逐渐获得主动地位。政府干预经济能力强，国有经济实力雄厚。中国有成功应对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也展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适应能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有助于增进中国的创新能力，提高经济的自主能力。

第五，扩大改革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将是应对中美竞争压力的关键。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但从实质上看，是中美体制、文化和营商环境的竞争。对于美国的压力，如果中国可以运用得当，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国内改革起到倒逼作用，有助于增进中国经济的自主性与科技创新，有助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平衡增长，进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发言结束后，王勇教授和在场师生就身份政治、两岸关系、能源安全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王锁劳副教授在总结时表示，

王勇教授从疫情全球化与中美关系出发，谈到特朗普对华政策的结果，再谈到拜登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走向，最后谈到了中美关系的未来，将对象国维度与美国维度、中国维度、全球维度完美结合，展现了王勇教授对于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三门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整场讲座逻辑性强、信息丰富、观点明确、结论扎实，充分体现出了王勇教授多年耕耘的收获。同时，本场讲座也对于更好地理解拜登政府对话政策与中美关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新芽沙龙·第33期

百年变局漫谈

2021年5月11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从区域性国家转变为世界性国家，当务之急便是了解世界、研究世界，以更好地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建院三周年之际，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共同举办“资深外交官谈百年大变局”系列新芽沙龙。本期沙龙邀请到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前驻巴西大使李金章先生，以“百年变局漫谈”为题做主旨报告。

李金章大使长期工作在我国对拉美地区外交的第一线，曾先后出任中国驻墨西哥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驻巴西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并于2003至2011年间先后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既熟悉我国对外政策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又对拉美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有着深入而独到的见解。李金章大使的发言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拉美局势”。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李金章大使首先深情回忆了2017年12月参加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情景。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高屋建瓴地论述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明确提出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书记说，世界格局之变，正所谓“物换星移几度秋”，

国际格局日益平衡，西方对全球事务的垄断逐渐被打破。尽管国际力量对比变化需要很长一个历史过程，但是潮流已经形成，大势不可逆转。总书记从战略的高度，全球的维度，历史的角度对新时期国际形势的走向做出了科学判断，给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回顾这几年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外交实践，更加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

李金章大使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加速崛起；二是美国走向相对衰落；三是国际秩序紊乱加剧；四是新科技信息引发人类生产生活的大变局；五是百年未见的新冠疫情波及全球，扮演着大变局加速器的角色。

李金章大使认为，现在变局远没有定局，从变局到相对的定局，世界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如何应对变局带来的挑战，如何抓住变局的机遇，建立何种国际体系，维系何种国际秩序等等，这关系到各国乃至世界的命运和前途，是全世界各国都需要回答的世纪之问。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由于各国利益关系相互交织，国际关系形成主体多样化，再加上国际关系固有的混乱时期造成了多变性，因此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变化景象似乎是目不暇接，甚至有一些冲击。

（二）中美关系

李大使指出，要厘清当前国际关系，首要是辨清主要矛盾在哪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主要的矛盾，或者最大的变量、变数，就是中国和美国的的关系。围绕中美关系的演变和走向，李金章大使谈及以下几点。

1. 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中美关系走到今天的地步？

中美建交 40 多年来，两国虽然经历过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是总体来讲中美关系还是经历了一段稳定向上的发展过程。但最近几年来，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这个关系经历了陡然剧变。特朗普公然宣称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中国锁定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特朗普对中国全面发力，所以两国关系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李大使认为，拜登上台后一百多天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不仅全盘接受了特朗普对华的那一套，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有什么变化，就是战略更清晰了，布局更加全面了，策略更加灵活了，手段更加狡诈了。反华甚至敌华的政策，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甚至美国社会一个基本的共识，甚至可以说已经确定为美国的基本国策。虽然中美之间有不少分歧，中方希望通过政治谈判来维护我们的尊严，在维护主权利益的基础上来妥善处理。

李大使指出，现在中美关系遭遇低谷的主要责任在美国一方。

一是美国的战略误判。美国人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较量已经终结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方式。美国错误地认为中国会像苏联一样垮掉，于是对中国进行防范遏制等方针，期待着中国的长城像苏联一样倒塌。

二是美国的战略迷茫。在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美国对一直以来坚持的对华政策的有效性感到迷茫。

三是美国的战略焦虑。按照美国的思维逻辑，中国的发展蒸蒸日上，一旦起来了要超越美国，必将取而代之，美国的百年霸业将不复存在。历史上的苏联和日本都曾经历过快速发展，成为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美国想方设法地整他们。

四是美国的战略决策。在将社会主义中国从主要对手之一锁定为头号对手后，美国拉开了中美势力较量的帷幕。中美的矛盾、摩擦、斗争将成为新常态，甚至将伴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这个坎绕不过去，中国只能奉陪。

2. 中国如何处理未来中美关系？

李金章大使认为，应对中美关系的巨大矛盾分歧，需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有战斗定力和民族自信。中国人民只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的崛起。

二是聚精会神、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只有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高质量发展，才能在大变局中占据主动，才能在世界格局中料敌先机，才能说话算数。

三是增强忧患意识，科学看待形势。发展是世界的主题，机遇仍然大过挑战，但是在大变局中不确定因素在增加，我们必须要有底线思维，精准防范，同时不要过于高估自己，要有忧患意识。

四是敢于亮剑，善于守拙。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的核心利益问题上，要划清不能触动的红线。比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国必须立场鲜明，勇于斗争，绝不退缩。狭路相逢勇者胜，和平是求不来的，要以斗争求和平。

五是创新发展，补齐短板。科技创新是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现在中国的科技实力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从华为等事件中可以看出，有些领域还是会被美国“卡脖子”。我们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科技创新方面要取得突破。

李金章大使强调，中美关系并非中国外交的全部，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推动构建新兴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治理和多边事务中维护祖国人民的利益。通过“一带一路”引领广交、深交朋友，做大朋友圈，深化广泛合作，促进文化发展。大变局可以带来大机遇，抓住机遇可以迎来世界范围的大胜利，

（三）拉美局势

李金章大使指出，在本世纪前十几年，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大国发展成为新兴大国，与中国等发展中大国一起实现了群体性崛起，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垄断，促使世界格局开始走向新的平衡。但在当前阶段，由于拉美地区多国政体发生激烈动荡，经济严重衰退，社会撕裂加剧，加之疫情的冲击，拉美很可能陷入新的危险，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突破发展困境。长远来看，拉美资源丰富，地大物博，具备了发展的物质基础，又拥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如果能够趁大变局的东风，对自己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彻底改革，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完全可

以成为拉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关于中拉关系，李金章大使认为，中国与拉美没有复杂的历史恩怨，在世界变局中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诉求，拉美是中国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双方都高度重视相互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四次访问拉美，双方的合作水平持续提高，利益融合不断加强，双边贸易突破三千亿美元，双边投资突破两千亿美元。

面向未来，中国和拉美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美国的小动作阻碍不了中拉关系的良好前景。中国青年一代走上外交第一线时，应多做夯实中拉关系基础的事情，一定可以把拉美地区变成中国外交可以团结的重要支撑力量。

发言结束后，李大使就中拉经贸合作、中国对拉美政策、西葡语专业学生职业发展等问题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并就如何在学校期间更好地为未来从事拉美研究打好基础与同学们进行了深入交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董经胜教授在沙龙总结时指出，李金章大使通过个人的亲身经历，对当前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中拉关系做了深入解读，体现了三者之间的联系、互动和影响，并对同学们研究拉丁美洲历史与文化提出宝贵建议，具有很强的启发和指导意义。